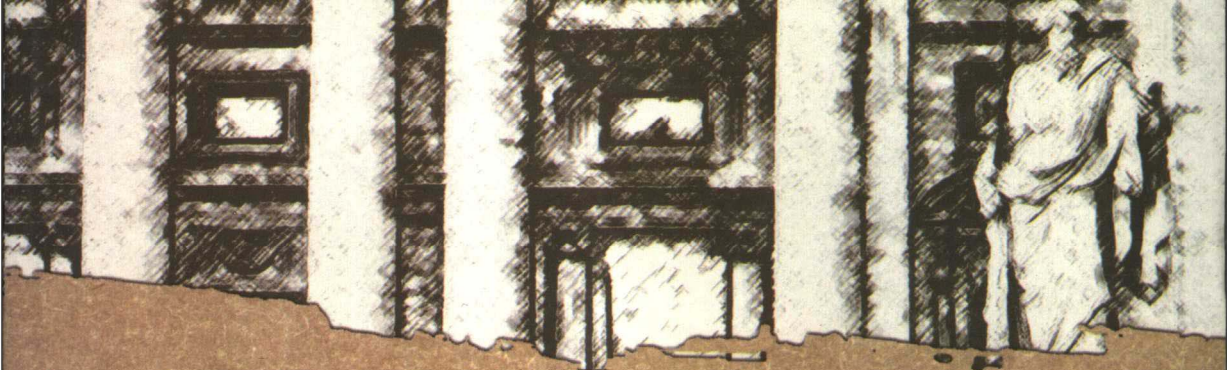




欧洲近代经验论 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 (修订本)

徐瑞康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徐瑞康著. —修订本.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307-05114-0

I. 欧… II. 徐… III. ①经验主义—哲学史—欧洲—近代 ②唯理
论—哲学史—欧洲—近代 IV. 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3715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32.5 字数:464 千字

版次:1992年9月第1版 2007年1月修订

2007年1月修订本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114-0/B·157 定价:50.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
部门联系调换。

序

在我们中国，凡是读过《实践论》的人，一看到或听到“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名词，大概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根源。因此，一看到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是讲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大概也就认为这与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揭露其思想根源有关。一般说来，这并没有错。讨论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文章或著作，如果有志于联系实际，多半是会，也应该借此揭露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批判其片面性等错误的。而且即使仅此一端，也就可充分说明研究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虽一贯受到批判，但并未绝迹。而且原有的或老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克服了，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又会不断产生。这是因为这两种思想方式或作风有其认识论上的根源，人们如果不是自觉地、切实地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很难避免犯这样或那样片面性的错误的。往往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克服了，在另外问题上又会重犯性质上相同或类似的错误。人要想一劳永逸地掌握一种“诀窍”，从此不犯任何错误，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客观情况总在不断发展变化，任何人也不可能掌握和预计到变化过程的全部细节，因此要绝对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人们能够自觉地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地了解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并注意加以防止，则就可以少犯或不犯某些错误，至少可以避免重犯某些错误。例如人们要是较透彻地了解了历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哲学是怎样产生发展的，它们起过怎样的历史作用，有哪些正确的、合理的因素，特别是怎样陷入片面性的错误的，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则就可以少犯乃至不犯性质上与之类似，或有内在理论联系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的

错误。而这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乃至经济效益，实在是无法估计的。

但是，研究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意义，决非仅在于可以揭露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的理论根源。尽管今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不论是唯理论或经验论，就其全体来看，都是错误的，也正如哲学史上的其他任何哲学体系或思潮，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比较，则在其全体上也都是错误的一样，但它们在所处的时代，总的说来都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进步思想，起过有助于新兴资产阶级反对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斗争的进步作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即使就其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主义也肯定它们有“片面的真理”，决不止是一堆错误的谬论。事实上，通常所谓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是指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新兴资产阶级早期反封建革命阶段与旧的经院哲学相对立的几乎全部新哲学思潮的总体，因为当时的重要哲学家，几乎全都可以归入这两个学派之中。而这是一个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推翻和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天翻地覆的伟大时代，是世界历史从封建时代向新兴的资本主义时代转变的阶段，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也必然促进哲学思想的大活跃、大繁荣、大发展，因此这也是哲学史上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那些最主要的哲学家，如英国经验论派的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大陆唯理论派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虽然因有某些共同倾向而被归入某一派，其实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各有自己新颖的独立见解，各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绝非同属一派就是相互雷同的。还可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这些哲学家，都不是像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代表人物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那样以哲学为职业的哲学教授，他们大都同时是科学家、政治活动家、宗教活动家等等，没有一个是纯粹以哲学为职业的，可以说都是“业余哲学家”。这一特点使这一时期的哲学也许没有以后德国古典哲学那样的思想深邃，体系严整，但同时也不像后者那样晦涩难懂，莫测高深。而这一时期哲学家的思想及著作，其内容的丰富新颖，其风格的异彩纷呈，则往往有为那些专业的哲学教授们所难以企及之处。此外，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继古希腊之后又一丰富多彩的繁荣时期，而其内容和形式则已摆脱了古代思想的朴素性，随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步

伐，特别是随着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而比古代大大前进了。总之，这一时期的哲学，与其先或其后的哲学相比较，都有其独有的特点，值得给予应有的重视。它本身是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决不在通常受人们重视的古希腊哲学或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之下。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研究，小而言之对西方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建设，大而言之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本身就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唯理论与经验论哲学虽本身有如上所述的重要性，但在我国哲学史界，却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至少是受重视的程度和它本身的重要性很不相称。例如在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方面，我们都可以举出一些知名的专家或有相当规模的研究中心，但在唯理论和经验论方面，情况就不能与之相比。正是有鉴于此，在结束十年动乱、拨乱反正，各项工作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初，我们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西方哲学史工作的几个人，当时主要的也就是杨祖陶同志和我，就商量应怎样来适当补救这方面的缺陷，尽我们的力量来对西哲史中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一部分进行一些研究，多培养几个这方面的人才，争取有朝一日武汉大学哲学系能成为国内研究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一个中心。杨祖陶同志是一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我们商定他的这一方向仍不变，只是今后可尽量向德国古典哲学与唯理论、经验论的联系方面多着力，也求其有助于唯理论、经验论哲学的研究。为此，从1978年开始招硕士研究生起，我们就一直招“唯理论与经验论哲学”及“德国古典哲学”两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从1987年起连续四届所招的博士研究生，也都分属这两个研究方向。到1990年为止，我们已招了硕士生10届共36人，其中研究唯理论与经验论哲学的24人，德国古典哲学的12人，博士生4届共7人，其中研究唯理论与经验论的5人，德国古典哲学的2人。迄今为止，仅研究生已完成的有关唯理论与经验论哲学的学位论文就有20多篇，其中不乏受到同行专家好评的优秀之作，不少篇已部分地或经压缩发表于各种刊物上。已毕业的获得学位的研究生中已有几位留在本系外哲史教研室或研究室工作，其余的也大都在各地有关单位从事西哲史的教学、科研或编辑工作，虽然也有小部分因种种原因而不

得不改行的。所以，我想，我们当初所设想的要加强唯理论与经验论哲学的研究，以补我国在这方面工作的不足的设想，应该说已开始逐步得到实现，虽然离目标，特别是在武大哲学系形成一个研究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研究中心这一目标，还相差很远。

虽然如此，但因为我们的历年招了这方面的研究生，同时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武汉召开了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几次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会，也出了这方面的研究作品，因此也已逐渐引起了国内甚至国外同行们的注目。可以说我们虽尚未达到目标，但已走上了通向这一目标的征途。

我们为走向这一目标所做的工作，除了上述培养这方面的研究生，召开有关的学术讨论会等之外，主要的还是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早在“六五”期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规划中，就有一项国家的重点项目，就是要编著一部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我们当时就承担了主编其中“唯理论”卷的任务，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后来在订“七五”规划时，据说有关领导认为目前尚不必忙于编写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可以先分头在各方面做些具体的研究工作，因此多卷本《西方哲学史》不再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规划，而是分头从事各部分的专题研究。因此我们的有关研究工作也仍在继续进行。1985年间，人民出版社约我编写一本《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我认为正与我们的计划和志趣相合，就毅然答应了下来，同时觉得集体的力量只要运用得好，总是优于个人的力量，因此就约了我们78、79这最早两届的研究生中已毕业正在从事专业工作的5位同志来与我合作，共同完成这一任务。这样既可提高作品质量，又可使青年同志得到锻炼提高。我们先集体讨论了整整3天，初步拟定了提纲，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分头去写初稿，最后由我总其成，修改定稿。这提纲还曾在全国外哲史学会中南地区会员大会上讨论过，也吸收了与会同志的宝贵意见。这一著作已于1986年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可算是我们在这以前对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我们这本《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人民出版社作为《西方哲学史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注目，在多种刊物上都见到了对该书的书评，认为有些新意，表现出了

哲学史著作的新面貌。我们这本书如果说有点“新面貌”，大概主要就表现在我们力求打破一般哲学史作品那种“列传式”的老框框，虽对每个主要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概貌也各作了简要介绍，但主要内容不是分别介绍一个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而是把这一阶段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在既对立斗争又相互吸收渗透中发展的全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然后分成关于认识对象、认识主体、认识的起源和途径、认识方法以及真理观等五个问题，就每个问题来看两派如何对立，如何争论，各派内部又如何演变，等等。这与通常哲学史的写法确实不同。我们认为这样写确实也可以引导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哲学史，有它的优点。但我们自始就没有把这种写法当作惟一或最好的方法，也没有把这一作品当作是我们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而看作只是初步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因为这一阶段的哲学既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决不是我们这一仅30万字的作品所能反映其全貌的，我们对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研究，也决不是以这书的出版为终结，而毋宁是以它为一新的起点，要继续前进、深入。

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下，1988年我们又在“国家第二批博士点基金”项下，承担了“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这一课题的研究任务，并在武大哲学系外哲史研究室的范围内组成新的课题组，对欧洲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几年来我们这一课题组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就是徐瑞康同志的这部《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

徐瑞康同志是1957年和我一起从北大来武大工作的。当时李达校长刚在武大重建哲学系，我作为院系调整前曾在武大老哲学系工作过的教师回武大工作，他则作为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分配来武大。我们一来就合作担任外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算来距今已有33年之久了。虽然中间因十年浩劫耽误了些时间，他又一度被调去搞过一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他也并未因此放弃西哲史的研究，而且两者也是可以互相结合并相得益彰的。“拨乱反正”以后，他就回到了西哲史的工作岗位，不久又担负了外哲史教研室主任的工作。近几年来，他已和我联名招了多届“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这一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

生，并且是“博士生导师小组”的成员。他一回到外哲史的工作岗位，对于要在武大哲学系建立一个唯理论与经验论哲学研究中心的设想就积极支持和全力推动，并且身体力行，自己也亲自积极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来已发表过许多篇有关这方面的很有分量、很有创见的科研论文。因此我们在承担了国家博士点基金项下的上述课题的研究任务之后，就商定在课题组内除分头作其他专题研究外，由他来总结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从与我所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同的角度，再写一部有关此课题的综合性著作，以作为所承担的该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经过他许多年的寒暑日以继夜的奋斗，现在这一任务终于胜利完成了。这部著作当然是他个人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但他在著作中既吸收了包括我们课题组成员在内的其他人的有关研究成果，而且在写作过程中遇有问题我们也经常共同讨论，在初稿完成后我们又通读了全书，就某些问题再共同讨论后提出过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所以在一定意义下这也确是课题组的集体力量的表现，代表了我们这课题组，也就是武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研究室在这一方面的现有水平。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否认这书是徐瑞康同志独立完成的个人专著的意思，只是表明，这书既作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确是经过一些共同研讨，特别是我作为该课题组的负责人，是认真读过全部书稿，并提出过意见的，因此这书中如出现错误，我也是应该负责的。

那么，本书究竟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在我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出版以后，又要就同一题材另写这样一部作品呢？对于这个问题，瑞康同志在本书的“前言”中已作了较详细的说明，我这里只简单地说一说。这是因为我所主编的那本书，主要是以问题为纲，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抓住其几个主要问题来分别论述各派各人的观点及其争论、演变过程，这虽有它本身的好处，但对整个思潮的发展过程，就缺乏总体上的详细阐述。此外，由于以问题为纲，将各个哲学家的观点分在各个问题上来介绍和评论，因此对每个哲学家个人的全部哲学观点或其哲学体系，也就难以给人一个较清晰的总的概念。而本书则在较详细、较完整地介绍每一位哲学家哲学观点的全貌或体系的基础上，着重在阐述这一阶段两派哲学在相互对立

和争论，又相互吸收和渗透的过程中的总的发展线索。粗略地看，可以说前书着重在理论上的横的展开，本书则着重在这段哲学的纵的历史发展。因此这两本书虽处理的是同一对象，但由于着眼的角度不同，是各有特点，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而并不能彼此代替的。

还可指出的是：我曾把通常哲学史教材的写法称为“列传式”，本书形式上似乎也未摆脱“列传式”的框框，那么它与一般的哲学史教材比起来，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应该说，本书实质上就是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一部“断代史”。它和一般西方哲学史教材的关系，首先也就是一般的“通史”和“断代史”的关系。在我国，仅“拨乱反正”以来所公开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或“欧洲哲学史”的通史式的教材已至少有十几种之多，相比之下，这方面的断代史却很少。尤其是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一段，除了上述我所主编的那一本之外，迄今还没有第二本。而其他如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希腊哲学，也都已有不止一种断代史性质的著作出版。就这段哲学史的重要性而言，这种情况也是很不相称的。因此出版从不同角度着眼，在内容和形式上各有特点的多种这方面的断代史著作，就出版的角度看，也决不是重复、浪费，而是作为文化传播和积累所必需的。就本书作为断代史，和现有一般通史性质的教材中相应篇章比较来看，除了内容篇幅要丰富充实得多，非一般通史所能企及之外，也还有它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色：

首先，本书较自觉地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理，注意把这段唯理论与经验论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当作一个总体，来探索其发展规律和逻辑线索，而不满足于仅仅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各个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这种探索是可贵的，但也是艰难的。不能说本书在这方面探索的成果已很辉煌，但即使是点滴的收获也是值得珍视的。

其次，本书除了通常较受重视的唯理论派和经验论派那些主要代表人物之外，对那些一般通史教材中或被完全忽略，或虽提到也仅作十分简略叙述的哲学家，如伽桑狄、马勒伯朗士、托兰德、沃尔夫等，也都列了专门的章节作了较详细的评述。作者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力，作了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使这段哲学史的阐述更趋完整了。

再次，本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也努力克服以往某些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而实则陷入片面性或教条主义

的错误观点或做法。例如对于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评价，特别是对其中的唯心主义，也并不因其为唯心主义而全盘否定，而是在首先肯定其同样属于总的反封建的进步思潮前提下指出其陷入唯心主义的错误和局限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本书对所阐述的每个哲学家都指出其“两面性”，但对这种两面性决不是笼统地贴上一个阶级标签完事，而是分析出每个哲学家的两面性都各自具有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分析具体矛盾的精神。还有，本书在指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同时，也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提示努力在这时期某些思想家中挖掘其辩证法的因素。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

总之，本书不仅是作为一部断代史，比一般通史的相应篇章篇幅较大，内容较充实而已，实在是提出了自己的不少新见解，有自己的特色的一部学术专著。

当然，本书所处理的对象，内容是十分博大精深的，而且作为哲学，其本身可能是一个永远做不完的课题。这个课题，可能是世界上永远被人研究的，我们这个课题组的成员，自然也还会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研究下去。本书也仍只是这个课题的一个初步的阶段性成果而已，因此它也必然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乃至缺点错误。再声明一句，对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衷心希望能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陈修斋

1990年8月于珞珈山麓

※ ※ ※

《现代哲学》杂志在1993年第3期以《着力加强西方哲学断代史的研究》为题，对本书的这篇序言作了转载；并附言，本文的“作者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当阅看本文校样时，传来陈修斋教授于1993年8月23日病逝的噩耗，在此谨表深切的哀悼”。

作者补记

2006年4月

前 言

这部著述最后题名为《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全书约40多万字，前前后后历经许多年，花了许多心血，如今算是完稿了。完稿之余，尚想作些说明。

我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和外国哲学研究室为该系西方哲学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博士生导师陈修斋教授是其中一位学术带头人；“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是该点招收和培养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之一，也是其从事科学研究的方向之一。陈修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和翻译家，多年来致力于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尤其是莱布尼茨哲学研究，富有造诣；其译著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论著《欧洲哲学史稿》（和杨祖陶教授合著）和《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论文《莱布尼茨哲学初探》等在学术界均深有影响。1988年，陈老师承担了属国家教委“七·五”科研规划的一课题“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试图把这一段哲学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对它作系统的深入的阐述。我原是他的学生，大概是我为提高研究生教学的质量已有著述这方面的论著的打算和具体准备，他便鼓励我参加课题组，投入这一研究。我接受了这个任务；自那时起，我不忘请教，并不论寒暑假均努力以赴。换言之，这部书稿乃作为陈修斋教授所领导的“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科研课题的组成部分而动笔和问世的。这是我首先要予以说明的。

在投入过程中我深感，开展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研究确实是一项很有现实意义的学术事业。众所周知，16世纪到18世纪，在西欧各国，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学派的出现，乃是哲学上重要的历史现象。它们涉及英、法、德、荷等国家，适应着新兴资

产阶级在早期反封建革命时期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复兴自然科学和反对神学对哲学的垄断的需要，把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提到首位，致力于对科学知识的起源和途径等问题的探讨，在反对经院哲学的共同斗争中彼此之间互相对立、互相渗透，经历了创立、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也为现代西方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可以说，这是西方哲学史上富有内容，富有特征，富有影响和富有哲学理论思维深刻的经验和教训的一段哲学。这样来看，把这段哲学视为相对独立的整体，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作专门的系统探讨和评析，就不仅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为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学文明的过去，建立科学的西方哲学史体系所必需，而且有利于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探源溯流，深入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本身。毫无疑问，这对推进高等学校西方哲学整个学科建设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尤其是我们认识到，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是深重的。照搬书本条条，照搬外国模式或固执着狭隘的经验，会使我们错误地判断国情，错误地制定方针和路线，妨碍着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认识我国现实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把革命和建设的事业推向前进。然而，今日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思想理论根源正与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性质上类似或有内在的联系；“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象，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象”^①。又，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它们虽然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但也“各有片面的真理”。它们中的合理因素以及已蕴含有的克服这些片面性的企图或尝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在批判和继承这样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论是为了破除和反对在我国建设过程中仍将难免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还是为了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注释[2]。

想武器，系统地探讨和了解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都将是十分必要的。

还应指出，由于这一时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与近代自然科学有密切的关系，即它既源自那时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又以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形成等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目的，最后却以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结局，因而开展对它的研究，总结它所提供的思维经验和教训，自然可为我国科学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即它以人的认识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心问题，而后者的主要领域乃是科学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哲学；因而开展这一哲学研究，对引导处于对外开放环境下的我国青年正确地认识和评析现代西方哲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将不无意义。

把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作为整体来研究，当可从不同的角度来着手。就所见的而言，一种是按理论问题为主，即把那时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论战所涉及到的认识论问题，归结为认识的对象和主体、认识的起源和途径、认识的方法以及真理和真理标准等问题，再逐个地从理论上加以横向展开；当然在这中间并不排斥对各个问题作历史的叙述。这种角度的研究是由陈修斋教授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一书所提供的。这是一种新颖的有益的尝试，令学界深受启迪。另一种是，按历史线索为主。在这方面，通常的西方哲学通史教材曾有不少有价值的尝试，如把那一时期的哲学按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划分，叙述其各自发展的线索等。但那些尚不是关于这一段哲学的专门论著，且尚不足以显示两大学派在相互的对立和统一中错综复杂的发展进程；所以我意欲从这个方面作努力和突破。恩格斯曾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 记得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期间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是如何地受到这段名言的触动和启迪，以致后来我竟走上了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出于对问题好作历史的叙述，于是，我在著述中思考和突出整个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创立、发展和终结的涵义和过程，在论述这段哲学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前因后果的基础上，着力于揭示其两大学派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和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显示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逻辑规律等，企图通过专著的形式在这方面有所充实和改进。自然，这大量地包含着对所涉及的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叙述。本书对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研究的角度和特点，可说即在于此。

除此以外，我还要说明，我在著述过程中充分地注意了吸收学界和我们的课题组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它们给了我许多启发；在这里，借此机会谨表示谢意。同时，我在著述过程中也还曾思索过下述诸问题：

如何更好地体现这样的观点，即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还是中间派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反经院哲学的方面，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应当肯定，在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中，唯物主义在对哲学最高问题回答上的正确性及其在整个哲学发展中归根结底所占的主导地位；唯心主义在对哲学最高问题回答上的荒谬性。但不能漠视，那时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蕴含着种种严重的局限，虽然它的出现是一种进步；那时的唯心主义终究有企图克服旧唯物主义局限的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是哲学认识发展中的必然环节。也不能漠视，那时中间派哲学的确实存在，如笛卡尔的二元论和休谟的不可知论等即是这样形态的哲学；它们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就如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对中世纪哲学的影响和康德哲学之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一样。

不仅要突出地叙述在这一时期通常被认为是“主要”的哲学家，如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和贝克莱、休谟等，也还要充分地叙述在这一时期往往被认为是“次要”的哲学家，如伽桑狄、马勒伯朗士、托兰德和沃尔夫等。他们在哲学发展中具有其自身固有的历史地位；忽视了他们，就难以对这一

时期的哲学作出完整的历史叙述。

在欧洲近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中占统治地位的乃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否认或忽视对那一时期主要是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唯理论哲学中所蕴含有的卓越的辩证法思想作研究，包括揭示其具体表现、固有特点、发展程度、产生根源，以及在整个辩证法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等。

把所涉及的某种哲学放到整个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历史发展和联系中来考察，将有助于确定这种哲学本身的基本性质、特征和贡献；否则为此将会争论不休。例如，本书把斯宾诺莎哲学放到克服笛卡尔二元论的整个过程中来考察，对其两重性和含混性予以揭示；把康德哲学放到和前此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联系中来考察，对其作为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综合”的地位加以确定以及对其所蕴含的尝试用来克服两者片面性的认识主体能动性思想给予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作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力量尚不十分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出现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占绝对的统治之后，虽都有反经院哲学的方面，也都摆脱不了经院哲学的束缚，从而往往都具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主要由于哲学家们所处各国的历史状况不同而有不同的特殊表现。探索和理解这些不同的两重性将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规律性。

此外，本书还留有篇幅阐述诸哲学家小传，谨以此象征性地表明，这一时期各种哲学思想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当时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而且与哲学家本人的具体经历和个性特征也有密切的关系，等等。

毫无疑问，关于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尚多，如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派哲学各自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欧洲近代各国哲学思想的相互影响问题；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相互联系问题；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人本主义和宗教思想问题；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以及欧洲近代经验

论和唯理论哲学诸家哲学思想的专论，等等。实在说来，这依然是一块有待垦殖的领域。而所有这一切，则都需要我们运用整体的观点^①于欧洲哲学的这种研究中，不断垦殖，努力探索，厚积薄发，方能有所成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企图现时就对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作出完整的准确的叙述，将是我难以设想的。有鉴于此，本书之不成熟性和错误自不待言。故恳切地祈望学界的师辈、友辈和读者们不吝赐教，我将不胜感激。

徐瑞康

1990年8月

2006年4月修订于武昌珞珈山

① 关于本书对所述这段哲学之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请参阅陈修斋、徐瑞康：《试论哲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现代哲学》1991年第4期）。该文从哲学史科学本身的性质和任务谈起，阐述了哲学史研究中整体观的提出、内涵和意义。实际上，本书的任务亦即在于：确立哲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运用它于欧洲哲学的断代研究中。